文 学 研 究

“《文选》编次无序”辨

汪 春 泓
(岭南大学 中文系,香港)

摘　要:《文选》编次涉及政治与学术及文学等因素,须参照《汉志》《文心雕龙》等著述,也涉及作为昭明太子所编纂,其间自然包含礼乐建设、祥瑞点缀、体国经野等义项,当然也要维护或营造储君萧统之形象,这一切均属《文选》编次的内在逻辑和依据。

关键词: 大赋编次;义尚光大;诗赋略;文选学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3)01-0078-12

从文献目录学角度看,在《隋书·经籍志》四之中,梁昭明太子萧统所撰《文选》三十卷被归为总集类①。它几乎收录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所谓“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所涉重要文体代表性作品②,亦与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选文以定篇”之文体论体例相近③。因而,关于各种文体及同一文体下所选篇目之排序,显然便是一个引人瞩目的课题,《文选》作为影响巨大的文章总集,它与最为经典的文章学著作《文心雕龙》同属“体大虑周”之产物,萧统和刘勰都深谙通变之道,此乃二书之共性,学界从微观上考证《文选》于《文心雕龙》之借镜作用,此种影响或许存在。然而,从宏观而言,前汉自成帝以至莽新,刘向、刘歆父子所开创“七略”之学,经由扬雄、桓谭、王充、班固、张衡、高诱、挚虞、左思、荀勖、李充、王俭、任昉、锺嵘、阮孝绪等著名学者文士之接受和运用,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云:“逮汉成留思,子政雠校,于是《七略》芬菲,九流鳞萃。”④遂凝聚为人文学术之共主性圭臬,建筑起汉魏晋士人之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若身为文士,其人于书无所不窥,则在相近层次之同道,就一定具备可相匹敌、可资对证和可相切磋的知识学术背景。因此,设若《文心雕龙》为甲,《文选》为乙,然则思索二者之间关系,就并非是乙受甲影响那么简单的事实,而更多应该是服膺同一知识谱系和思想观念路径依赖下,各自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的关系。而何为此一如山似海的学术、文章之大背景?则正是班固所编撰向、歆之学于《汉书·艺文志》之谓也。如果以此作为高屋建瓴之视野和视角,对于某些聚讼纷纭之问题就可得以解释。

明吴讷《文章辨体·凡例》云:“《文选》编次无序,如第一卷古赋以《两都》为首,而《离骚》反置于后,甚至扬雄《美新》、曹操《九锡文》亦皆收载,不足为法。”⑤吴氏看法失之于草率;甚至如宋元间陈仁子《文选补遗》称:“又不当以诗赋先诏令奏疏,使君臣失位,质文先后失宜。”⑥这更是无稽之谈!由于无视《文选》编纂者知识学养储备之无涯涘矣,就认为《文选》选文编次存在不经意之罅漏,此种观点经不

收稿日期:2022-04-12
作者简介:汪春泓,男,浙江嘉兴人,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魏徵等:《隋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082 页。
②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535 页。
③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 619 页。
④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 231 页。
⑤ 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9 页。
⑥ 骆鸿凯:《文选学》之《源流》第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77 页。

起仔细勘察，对于昭明太子萧统而论，也是极不允当之偏见。同为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叙》曰："梁昭明特标选目，举世称工。"①就表达截然相反意见，他体察到《文选》选文背后依托着自己的逻辑和理念，而其编次正是此种逻辑和理念的具体呈现，现谨辨析如下。

一、作为参照：《文心雕龙》文体论之篇次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②此序中王氏所谓"文学"，实质上主要就文体而论，关于赋之为体，无论大赋和小赋，总之堪称汉代最具代表性之文体。而《诗经》大致上以四言句式为主，在整个两汉时期，观四言诗，除了前汉景帝朝韦孟及宣帝朝韦孟六世孙韦玄成各作四言诗二首之外③，几乎后继乏人。在形式上，《诗经》即使在武帝朝被尊列为五经博士之一④，然而，在两汉文学史上，《诗经》所展现四言诗体式却几乎告退。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在当时唯有赋可称为其最具标志性之文体，而在七略之六略分类中，向、歆父子所开创之诗赋略具有划时代意义。在今本《汉书·艺文志》中，诗赋略之排序为先赋后诗，盖正缘于赋之当时地位使然，赋作高踞雅文化和精英之层次，而按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八云："吕氏曰：'太乐，令丞所职，雅乐也。乐府所职，郑卫之乐也。乐府虽郑卫之声，然天子所常御，上至郊庙咸用焉。'"⑤乐府虽亦用于郊庙，但终归于俗文化和非主流之地位。从《汉志》看，所谓诗赋略之诗特指歌诗，它记录"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⑥，因而属于乐府之类作品，它们经"诗官采言"，从各地收集上来。然则何以名之为诗赋略，而非赋诗略？此乃由于诗赋乃两个名词并列的联合结构，若作赋诗，则会理解为以赋作动词的动宾结构，故而诗赋略非先诗后赋之名词组合会造成误解，诗赋略就成为不二之定名。缘于在向、歆心目中赋比诗重要，有所谓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和杂赋，前三者胪列作者之名和篇数，而歌诗作者之名则大多付诸阙如，概属无名氏之作。按《文心雕龙·诠赋》复述向、歆之言曰："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⑦所以呈现于诗赋略中，必然赋在诗之前。

至于《文心雕龙》文体论首列《明诗》《乐府》《诠赋》《颂赞》四篇，回应《汉志》诗赋略，体现于其文体排序，刘勰何以将诗、乐府置之于赋之前？首先，诚如汉代赋比歌诗重要，因而，向、歆诗赋略自然先赋后诗，到魏晋宋齐梁，从《诗经》到四言诗，经历两汉蛰伏期，终于在汉末，诗迎来五言诗之勃兴。萧统《文选序》谓之曰："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⑧五言诗为中国诗歌创作开启奔涌大闸。按锺嵘《诗品序》云："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⑨所以从汉代到宋齐时期，五言诗置换赋体之地位，成为这一时代最重要文体，正因为刘勰考虑到文坛此种新态势，所以对《汉志》诗赋略先赋后诗格局也作出相应之调整。其次，就诗学理论和文体发展演变史而言，诗乃《诗》之衍生物，二者具有最直接渊源关系。《文心雕龙·宗经》叙《五经》与分体文章之源流关系曰："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原因是此判断乃基于向、歆《七略》之蓝本。

---

① 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 页。

② 《王国维遗书》第十五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第 1 页。

③ 《汉书·韦贤传》，班固撰，王先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汉书补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805—4822 页。

④ 参见《汉魏博士考》，《王国维遗书》第一册，第 4 页。

⑤ 王应麟著，张三夕等点校：《汉艺文志考证》，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70 页。

⑥ 班固撰，王先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汉书补注》，第 3023 页。

⑦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 98 页。

⑧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2 页。

⑨ 锺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4 页。

从抒情之自然需求看,观《汉志》六艺略之《诗》类总结曰:“《书》曰:‘诗言志,哥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哥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哥。”已揭示诗歌是人感于哀乐之抒发;刘勰对此深有体会,在《明诗》之外,为何另立《乐府》?《文心雕龙·乐府》云:“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①于《明诗》《乐府》两篇之开头,刘勰将一篇《毛诗大序》拆分,分别昭示于二处,《明诗》篇云:“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②此即上述“诵其言谓之诗”;《乐府》则云:“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③此则为上述“咏其声谓之哥”,足证刘勰于《汉志》可谓浃髓沦肌矣!

再循《汉志》之诗赋略评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呼应《诗》之“故哀乐之心感”④,由《诗》到诗赋略之源流性叙述看,《汉志》前后勾连,水到渠成;《文心雕龙·哀吊》曰:“《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从六义、四始等概念来看,《诗》全方位覆盖“诗”这一文体,而赋仅占《诗》六义之一端,《文心雕龙·诠赋》借用“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⑤。此亦反映刘勰于向、歆诗学之接受和阐释。

诗赋略又叙及春秋时期诸侯间赋诗言志传统,引述子曰:“不学《诗》,无以言。”然后概述其演进:“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由于周代礼乐制度式微,《诗》学逐渐延伸至布衣之士,自荀卿、屈原等“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再往后,遂衍生出宋玉、唐勒,以至汉代枚乘、司马相如以及扬雄作品,若用扬雄之言区分“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便清晰地揭示《诗》、歌诗以及辞赋之流变。

而《文心雕龙》之文体论主张宗经,呼应“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⑥,首列《明诗》等四篇,此乃因应时代发展演变,论文应与文坛文体消长之新形势相一致,折射其与时俱进的敏锐触觉,而实质上,此与《汉志》确立《诗》至诗赋略之线性承传关系可谓桴鼓相应。自《诗》而下,上已述及,精英阶层诗衰歇,而赋兴盛。就赋体而论,诗赋略将赋分列为四种类型,《汉志》诗赋略整合赋史作家作品,反映向、歆标举宋玉、唐勒、贾谊、枚乘、司马相如以及扬雄,除扬雄之外,宋玉、唐勒、贾谊、枚乘和司马相如均列于屈原赋之属,然则扬雄赋被置于陆贾赋之属,盖出于班固之见,缘于扬雄对屈原有所微词,故须有所区隔。总之,从“词赋之宗”屈原以下,宋玉、唐勒、贾谊、枚乘、司马相如以及扬雄构成战国以至前汉文章主流阵容,他们庶几是从《诗经》《楚辞》即“风骚”肇始,以至布衣抒情之杰出代表,其文章学意义超越其余三者之辞赋,昭示文学发展之方向,此赋学观亦为刘勰统摄于《文心雕龙·诠赋》之内。

二、《文选》开卷编次与大赋地位及立国气象之关系

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记述:“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⑦北朝士人比南方文人

①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 85 页。
②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 65 页。
③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 84 页。
④ 《上博楚简》之《性情》曰:“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李零:《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版,第 67 页。
⑤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 98 页。
⑥ 《文心雕龙·宗经》,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 28 页。
⑦ 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183 页。

更重经学,当颜之推入北,发现北人心目里“文集只有诗赋铭诔”,此说无论深浅,总之反映时人之共识;试看刘勰文章学之创作论部分,譬如《神思》《情采》《比兴》《物色》诸篇,似也更对应诗赋略脉络下各体文章之写作。按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所言“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而突出“文义”特质之文集,亦与《诗》之流裔有更多交集,换言之,文集以体现诗赋略特征为主。

黄侃评《文选序》曰:“此序,选文宗旨,选文条例皆具。宜细审绎,毋轻发难端,《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彦和《文心》一书,皆其翼卫也。”①黄氏认为《文选》选文审慎,后人不要轻易质疑,而且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和刘勰《文心雕龙》均可以互相参看。此说极见其学有根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林喜“文义”,也重“文史”,故《史记》《汉书》尤获尊崇,而载录于《史记》《汉书》之司马相如、扬雄等文豪之大赋等作品,时人自然视之为经典,珍之如拱璧!它们进入萧统之视野,为《文选》所收录,亦属势所必然之事。从两汉以降,赋体鼎盛势头稍减,这是由于诗和赋形成竞争对冲所致,然在中国文章学史上,自魏晋以至明清,赋作为一种文体,文人赋作始终占据文坛重要空间,其中小赋尤然。《文选》后出于《文心雕龙》,它们共同依傍《汉志》,前已论及《文心雕龙》既树先诗后赋之范式,然则《文选》却依然步趋《汉志》诗赋略,其选文编次为先赋后诗,个中缘故,需要学者分析和领会。

由于大赋地位尊崇,它居于文章众体之首,《文选》此种编次易于达成共识。桓谭《道赋篇》云:“余少时见扬子云丽文高论,不自量年少新进,猥欲逮及,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致疾病。子云亦言:成帝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诏使作赋,一首始成,卒暴倦卧,梦五脏出地,以手收内之,及觉,大少气,病一年。”②可见大赋写作,艰苦卓绝,不免“精思太剧”,以致“疾病”,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写作工程!《文心雕龙·神思》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③因此,一般诗作难以被目之为“巨文”,唯有大赋当得上“巨文”之美称。

陆云《与兄平原书》云:“又古今兄文所未得与校者,亦惟兄所道数都赋耳。其馀虽有小胜负,大都自皆为雄耳。张公父子亦语云,兄文过子安。子安诸赋,兄复不皆过,其便可,可不与供论。云谓兄作《二京》,必传无疑,久劝兄为耳。又思《三都》,世人已作是语,触类长之,能事可见。”④文士生命价值体现于文坛争胜,然则与古今大家较量,大赋之写作就被视作铁门槛,它最能考验文人之才性、学识和功力,班固《东都赋》云“斯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⑤希冀超越前贤,留名青史!此令历代大赋作家满怀突过前人之竞赛心理,要与前贤一较高下。陆云和兄长陆机书信谈及《二京》《三都》均是其久蓄于胸之劲敌,而且似乎陆云认为《二京》更富有文章学价值。

按《文选》开卷之编次,展示梁代立国之气象,此种气象隐含施政之理念。设若《文选》选文定篇以诗位于赋前,而诗大致承袭孔子“诗可以怨”之传统,故而隐含国家读本意义之《文选》则开卷不祥,令国祚不永,似有违礼乐点缀之初衷。而赋在诗前则不然,《文心雕龙·诠赋》,刘勰勠力于“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云云,为文体溯源流,恰是题中应有之义,意在还原赋体产生、发展之历史过程。按《文选》以赋体名篇列于卷首,显然其意与《文心雕龙》迥然有别。黄侃评《文选》开篇之“赋甲”“京都上”,引《文心雕龙·诠赋》“若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曰:“据此,是赋之分类,昭明亦沿前贯耳。”⑥所谓京都赋之“体国经野”云云,可以彰显开国气势。班固《东都赋》明确表示作文实有“究汉德之所由”之目的⑦,属于后汉“宣汉”国家工程下

① 黄侃著,黄延祖重辑:《文选平点》卷一,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 页。
② 朱谦之校辑:《新辑本桓谭新论》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52 页。
③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 373 页。
④ 黄葵点校:《陆云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141 页。
⑤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第 42 页。
⑥ 黄侃著,黄延祖重辑:《文选平点》卷一,第 3 页。
⑦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41 页。

之个体项目,至后世依然可以绽放其“义尚光大”之威力。而自两汉以降,南北王朝更迭频仍,而华夏正朔之攸归,恰是晋宋齐梁诸帝梦寐之所求,凭藉昭明太子《文选》开篇之大赋,内含凸显当朝气象不凡之用心,令之嵌入世人之灵魂,从而有助于巩固政权合法性之基础。

由于自天监元年登基以至太清三年驾崩,梁武帝在位四十七年,几乎横跨整个梁代,所以其执政理念洵为“吾道一以贯之”,而此种理念也由《文选》第一至第九卷所选赋作表述无遗。

关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之张翕、进退、奢俭等取态,梁代朝野见解较为相近;而且两汉辞赋讨论,大致上围绕屈《骚》和司马相如大赋而展开,故而《文心雕龙》有《辨骚》和《诠赋》二篇。此为确立《文选》大赋之编次,也有助于达成共识。《梁书·张缵列传》记载大同九年张缵撰《南征赋》云:“我皇帝膺箓受图,聪明神武,乘衅而运,席卷三楚……戢干戈以耀德,肆《时夏》而成功。放流声于郑、卫,屏艳质于倾宫;配轩皇以迈迹,岂商、周之比隆……惧贻笑于文、景,忧象贤之覆悚;虽苞蘖以代兴,终夷宗而殄族……无矫且以招宾,阙捐繻而待贵。实祗敬于王典,怀鞠躬而屏气。”①此赋中所谓“膺箓受图”表明萧衍不愧为天授神与之真命天子,而且以前汉文、景帝为榜样,“放郑声”“屏艳质”,梁武帝厉行俭朴,戒除奢靡。

《梁书·武帝本纪上》记载在齐朝覆灭之前夜,梁武帝下令云:“孤忝荷大宠,务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厉微躬鹿裘之义,解而更张,斫雕为朴。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绂冕,习礼乐之容,缮甲兵之备,此外众费,一皆禁绝。御府中署,量宜罢省。掖庭备御妾之数,大予绝郑卫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甿庶,菲食薄衣,请自孤始。加群才并轨,九官咸事,若能人务退食,竞存约己,移风易俗,庶期月有成。”②《梁书·武帝本纪中》记述天监元年诏曰:“宋氏以来,并恣淫侈,倾宫之富,遂盈数千。推算五都,愁穷四海,并婴罹冤横,拘逼不一。抚弦命管,良家不被蠲;织室绣房,幽厄犹见役。弊国伤和,莫斯为甚。凡后宫乐府,西解暴室,诸如此例,一皆放遣。”③加之梁武帝信佛,其《净业赋序》自称即位后蔬食、不噉鱼肉,且断房室之事④。

缘此可以判断张缵《南征赋》迎合武帝之旨意,于此社会主旋律,君臣都产生共鸣。身为太子萧统编撰《文选》,其开篇所选大赋,就须处理好恢弘国势与崇尚俭约之矛盾,盖非恢弘不足以张大新朝之声威,且非俭约则恐重蹈前朝之覆辙。然则梁武帝时代,本不存在迁都之争议,在如何处置按时代先后之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甘泉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南都赋》以及左思《三都赋》,就谈何容易!从大赋发生学而言,司马相如赋无疑可称始作俑者,但是《韩非子·五蠹》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⑤观《子虚赋》《上林赋》,均弥漫着战国纵横家“争于气力”之气息,其“赋家之心”主要从自然地理之地势、物产各个方面,来“苞括宇宙,总览人物”⑥,来为“上林苑”所代表的武帝集权专制张目献媚,因而招致讥讽⑦。扬雄《法言·吾子》曰:“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

---

① 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496 页。
② 姚思廉:《梁书》,第 15 页。
③ 姚思廉:《梁书》,第 35 页。
④ 道宣:《广弘明集》卷第二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影印 1991 年版,第 346 页。
⑤ 梁启雄:《韩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471 页。
⑥ 刘歆等撰,王根林校点:《西京杂记》卷第二,《西京杂记》(外五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9 页。
⑦ 阮籍《猕猴赋》称:“躭嗜欲而眄视兮,有长卿之妍姿。”陈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44 页。

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①相如入室,贾谊升堂,语带嘲讽,因为孔氏之门绝不会用赋来品评高下,故指在赋写作方面,就思想性层面来比较,相如赋存在“劝百讽一”之弊②,故相如实际上不及贾谊。而究其根本,乃暗讽隐然潜在的儒家道统未能发挥其制衡作用。故而《世说新语·文学》第 81 条云:“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刘孝标注曰:“言此五赋是经典之羽翼。”③此是孙绰将《三都》《二京》与《子虚》《上林》相比较之后,所得出之结论,遂直接影响《文选》之编次。

三、《文选》赋体编次与历代“论都”倾向之关系

《后汉书·杜笃列传》载:“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曰:……窃见司马相如、扬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谨并封奏如左……太宗承流,守之以文。躬履节俭,侧身行仁,食不二味,衣无异采。赈人以农桑,率下以约已,曼丽之容不悦于目,郑卫之声不过于耳……富衍于孝景,功传于后嗣……故创业于高祖,嗣传于孝惠,德隆于太宗,财衍于孝景,威盛于圣武,政行于宣、元,侈极于成、哀,祚缺于孝平。传世十一,历载三百,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章,皆莫能迁于雍州,而背于咸阳……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而主上方以边垂为忧,忿葭萌之不柔,未遑于论都而遗思雍州也……意以为获无用之虏,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谷之渊;远救于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今国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时风显宣。徒垂意于持平守实,务在爱育元元,苟有便于王政者,圣主纳焉。何则? 物罔挹而不损,道无隆而不移,阳盛则运,阴满则亏,故存不忘亡,安不讳危,虽有仁义,犹设城池也。”④李贤等注曰:“笃此赋每取子云《甘泉》《长杨赋》事。”⑤在前后汉之间,扬雄学术思想及文章发挥承前启后之影响。武帝身后,前汉朝廷就掀起一场崇文抑或尊武之争,这也影响西、东“京都”之争,当武帝穷兵黩武之盛势一去不返之后,杜笃远绍扬雄,左袒乎内敛、守成之政治主张,于是成为“论都”之盖棺定论矣! 何焯《义门读书记》评班孟坚《两都赋序》曰:“此赋盖因杜笃《论都》而作……前赋兼戒后王勿效西京末造之侈,又包平子《两京》之旨也。词藻不如相如,其体制自足冠代。”⑥何氏所言甚确!

汉魏晋时期,文士接力赓续,其间有数的几篇大赋作品,后世作者心雄万夫,无不以前代名家作为效法之楷模和赶超之对手,力求后出转精,陵轹前贤。萧统将班固《两都赋》置于《文选》开篇“京都”之首,一则与班固《两都赋序》述及大汉“崇礼官、考文章”以“润色鸿业”有关,此也同样体现《文选》藉大赋以营造盛世景象之用意,萧统明确地以此来宣明心志;另则《两都赋》受扬雄赋学思想之影响,实质上要以《东都赋》压《西都赋》一头地,也正是回应扬雄论赋“讽”“劝”比例之质疑,作为接受两汉人文精神主潮洗礼之班固,深受董仲舒、刘向及扬雄等大儒之影响,尤其所撰《汉书》十《志》之《地理志》《艺文志》,足见为结撰大赋所需之资源,无论四方自然地理、历代政区沿革,还是“岁纪绵邈”之人文精神谱系,班氏均获得充裕之滋养,从而对其文章产生形塑之作用,《两都赋》之作者,似乎非班固莫属。身为史学家,班固回望前汉十一帝之文治武功,寻绎其史观,犹如《西都赋》所谓:“流大汉之恺悌,荡亡秦之毒螫。”⑦而反秦之主旨就是要以礼乐仁政来取代暴秦虎狼苛政,在赋史上,深谙秦汉学术思想转型的班固之所以凭藉《两都赋》后来居上,盖缘于若认同《子虚》《上林》为纵横家、小学家之赋,然则《两都》则

---

①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三,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45 页。

②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太史公曰居然有“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云云之评论,显然是后人添加之语,但也反映扬雄所言,切中要害。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073 页。

③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60 页。

④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 2595 页。

⑤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 2608 页。

⑥ 何焯著,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文选·赋》,北京: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857 页。

⑦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第 30 页。

属礼学家、史学家之作也,班固与时俱进,故而在大赋浸淫、融合儒家观念方面,在确立儒家“于道最为高”之新价值评估体系内①,《两都赋》自然凌驾于《子虚》《上林》之上。《东都赋》云:“然后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若乃顺时节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②故相形于班固之礼乐正道,司马相如之丛林法则便黯然失色。班固《东都赋》云:“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泝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③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批评司马迁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执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④文章两司马,司马相如与司马迁属于同时代之士,观念相去不远,于是亦可见司马相如赋在思想见识方面,已如明日黄花。

至于在《文选》中,张衡《二京》《南都》三赋排序紧随班固《两都》之后,何以得享此殊荣?盖由于在思想性和批判精神而论,张衡无疑居于大赋众作之巅峰地位。《西京赋》藉凭虚公子之口书写“西京之事”,意在颠覆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之写作倾向,暗讽秦皇、汉武殊途同归,均骄奢淫逸。而《东京赋》乃相对《西京赋》之拨乱反正,扬东而抑西,二京相较,任何物欲层面之辉丽万有,都不及仁义培植和礼乐建设更加可贵。《东京赋》云:“守位以仁,不恃隘害。”深沟高垒也难以拯救暴政之灭亡。《晋书·左思列传》记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曰:‘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京》文过其意……’”⑤此评洵为精当!

关于都赋,除了《文选》名篇之外,汉魏六朝文章学史上,还有傅毅、徐干、吴质、刘劭、王廙、何桢、庾阐、曹毗、吴均等均涉猎此一主题之大赋写作,而六朝偏安江左,自东晋桓温、刘裕北伐失利之后,齐梁君臣再无问鼎中原之雄心。反观《子虚》《上林》推波助澜乎武帝之好大喜功,六朝君臣岂敢耀武扬威?所以司马相如屈居班固、张衡、左思、扬雄,甚至潘岳之后,此乃时风众势使然,盖良有以也!

萧统《文选序》叙述《文选》编次体例之一为:“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即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上林赋》本名为《天子游猎赋》⑦,因而若按时代相次,则大赋鼻祖司马相如本应占据《文选》赋体首席之座次,然而编者巧妙地于同一文体再作类分,于是《子虚》《上林》被名之曰“畋猎”类,被置于京都、郊祀、耕藉之后,故意令司马相如失去居首之地位。

而左思《三都》跻身《文选》开篇“京都”赋之列,恰也缘于因应时势之发展。关于在《文选》大赋诸篇内,左思《三都赋》竟然与班、张之赋鼎足而三,如是排序,一则缘于此赋令“洛阳纸贵”,左思得享大名;另则亦贯彻萧统《文选序》所谓“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即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⑧可见萧统文章学持新变进化和反对复古之主张,当然在“新变派”内,萧统属于稳健派。骆鸿凯《文选学》之《义例》第二指出:“按登选之

① 《汉志》诗赋略关于儒家者流的评语,见班固撰,王先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汉书补注》,第 2966 页。

②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第 27 页。

③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第 41 页。

④ 班固撰,王先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汉书补注》,第 4371 页。

⑤ 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376 页。

⑥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第 4 页。

⑦ 《史记》,第 3002 页。

⑧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第 2 页。

文，虽甄录《楚辞》与子夏《诗序》，上起成周，其实偏详近代。"①遂顺应西晋皇甫谧、张载、刘逵、卫权及张华等人之赞誉，令近代文士左思亦跻身《文选》大赋作者之列。至于《文选》第一至十九卷主要为大赋、小赋作品，其赋体总目下再以主题分类，譬如第十五卷赋辛"哀伤"类选篇，计有：司马长卿《长门赋》、向子期《思旧赋》、陆士衡《叹逝赋》、潘安仁《怀旧赋》《寡妇赋》、江文通《恨赋》《别赋》，对照《文心雕龙·哀吊》，刘勰历数哀文，将西晋潘岳推至"莫之或继"之高度②；《文心雕龙·指瑕》称："潘岳为才，善于哀文。"③这说明两晋至齐末乃极为黑暗感伤时代，士人感同身受，甚或遭遇悲惨命运，使得陆机、潘岳、江淹能够写出动人的哀伤小赋，在此主题下，《文选》如是"偏详近代"，尤对抒情小赋之编次作这般安排，此背后自有文学史之依据；再者建安以来，五言腾跃，所以与曹魏时期曹子建等诗人相比较，《文选》所选五言诗作，其中晋宋齐梁诗人潘安仁、左太冲、谢叔源、谢宣远、谢灵运、谢惠连、谢玄晖、陶渊明、颜延年、鲍明远、沈休文、江文通等诗人作品就占据更多篇幅，几乎后来者居上，成为五言诗之主力！就此列名《文选》作家光谱看左思之崇高地位，已可略窥编纂者文学史家之胸襟！

齐国临淄人左思在撰写《三都赋》之前，曾写作《齐都赋》，构思十年，遂完成皇皇巨作《三都赋》，他"自以其作不谢班张"，胸怀与班、张分庭抗礼之底气，果然为自己预设《文选》开篇以班、张、左为大赋三巨头之文学史座次。西晋在武帝后期，就逐渐步入政治危机，至晋惠帝，内讧加剧，文士死于非命者触目惊心。因而作为时代亲历者，左思比晋宋时期谢灵运更早转移目光于自然山水景物之美，当然其宏观书写与谢灵运微观描摹存在笔法之差异，兹不赘述。而在整个大赋史上，《三都赋》之《吴都赋》尤显其音律铿锵，气象万千，声势磅礴，夺人魂魄！在此篇中，左思"辞藻壮丽"个人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

缘于身为临淄人，抱持正统在北的固有观念，因而在《魏都赋》中，左思将邺下曹魏阵营赋予正统之晖光，一派"蕙风如薰，甘露如醴"之景色④，甚至笔下祥瑞与诗礼相发，佐证"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之理念。总之对于三国时期曹魏政权所给予赞美和歌颂，其溢美之程度远超同样奉曹氏为正统所归之陈寿《三国志》。

覆按《南齐书·高帝本纪上》称萧道成乃"汉相国萧何二十四世孙也"⑤；《梁书·武帝本纪上》亦谓萧衍是"汉相国何之后也" ⑥。

即使世居江南，齐、梁开国君主也要远追萧何为其先祖。隋代大儒王通撰《中说》，世传版本真伪存疑，然而今本《中说》卷第六《礼乐篇》云："程元问六经之致。子曰：'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辩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⑦关于何谓"断南北之疑"，阮逸注曰："晋东迁，故南朝推运历者，因以齐梁陈为正统；后魏据中原，故北朝推运历者，以北齐、周、隋为正统。于是南北二史夷虏相称，而天下疑矣。《元经》者所以尊中国，故中国无主则正统在晋宋；中国有主则正统归魏、周。"南北政权对峙之际，双边争夺正统之归属，故此说绝非空穴来风，当时似无定主，而王通尊中国，中国无主，则暂且依托于晋宋，而一旦中国有主，则正统倏然北返，魏、周就成为正统加冕之新主。齐梁萧氏以己属北来名人之后自居，然则正统在我，亦以为毋庸置疑。故而，左思《三都赋》以曹操之邺下政权为掌握正统之一方，令蜀、吴皆拜伏其膝下，对此，梁武帝父子并无违和之感，反而认为此种立场可为皇梁辩护，因此左思也身登大赋作家鼎足而三的煊赫地位，此应包含"政治正确"元素于其内也。

---

① 骆鸿凯：《文选学》，第 34 页。

②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 172 页。

③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 505 页。

④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第 124 页。

⑤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 2017 年版，第 1 页。

⑥ 姚思廉：《梁书》，第 1 页。

⑦ 王通：《中说》卷第六，四部备要本，台北：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5 页。

四、《文选》编次与昭明太子身份及自我形象塑造之关系

按《南史》《梁书》之叙事,梁代昭明太子所编撰《文选》更多祖述《诗》学之传统,而在梁陈期间,署名南朝陈徐陵所编之《玉台新咏》则更体现汉乐府之余韵,铸成宫体淫靡之口实。此皆由编纂者身份地位所决定,在公众面前,昭明太子必须展示自身嫡长子王位继承者之姿态,而萧纲、萧绎却有意借艳情来掩饰一己觊觎权力之野心。

观齐梁文坛,缘情绮靡可被视作主流文风。曹丕《典论·论文》谓“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①,这是就文才和写作经验而论,至于宫廷风习,梁武帝三子萧统、萧纲和萧绎,似乎都被唯美和浪漫特征文学思潮所裹挟,三者实际上观念趋近,譬如萧统《文选序》云:“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此所谓“能文”,展现为“文华”,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征圣》也②;至于“沉思”“翰藻”同样凸显创意和美文之特质。萧纲《与湘东王书》云:“性既好文,时复短咏……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③其诗学乃建构在《风》《骚》背景下之“吟咏情性”;《梁书·刘孝绰列传》云:“时世祖出为荆州,至镇,与孝绰书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坟,吟咏情性,比复稀数古人,不以委约而能不伎痒。”④三萧无不具有“吟咏情性”之创作冲动。

江淹《知己赋》云:“潜志百氏,沈思六经。冥析义象,该洽性灵。”⑤故所谓性灵,既不离百氏、六经,却又独出机杼;《梁书·徐勉列传》载其造宅园是为了“以娱休沐,用托性灵”之用途⑥。故此,主张性灵,推崇抒情文学,在文苑蔚然成风。《金楼子·立言篇九下》第 51 则云:“然而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⑦将“文”从与儒、学、笔交集含混状态中区隔开来,然而,其所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再结合当时盛行之声律、丽辞和事类等文章学形式手段,此“文”便在唯美、主情之征途上进一步狂飙突进,则几乎不受儒家经学之束缚,会开辟中国式浪漫主义文学之路径,此亦与萧纲提倡“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同调⑧。萧纲、萧绎皆置刘勰“衔华而佩实”之“佩实”一端于不顾,却与乃兄萧统划出一道相异之界线。

同为武帝之子,萧纲、萧绎虽表面上不敢挑战东宫太子萧统储君之地位,暗地里却难以遏制内心所掀起狂涛巨澜。《后汉书·郭太符融许劭列传》云:“论曰:庄周有言,人情险于山川,以其动静可识,而沈阻难征。故深厚之性,诡于情貌;‘则哲’之鉴,惟帝所难。”⑨信哉斯言!《梁书·刘孝绰列传》记载当

---

① 《全三国文》卷八,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1097 页。
②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 19 页。
③ 姚思廉:《梁书》“庾肩吾列传”,第 690 页。
④ 姚思廉:《梁书》,第 481 页。
⑤ 丁福林等校注:《江文通集校注》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08 页。
⑥ 姚思廉:《梁书》,第 384 页。
⑦ 萧绎撰,陈志平等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70 页。
⑧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二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24 页。
⑨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231 页。

时出为荆州之世祖萧绎与刘孝绰书信往还,刘孝绰答曰:“……当欲使金石流功,耻用翰墨垂迹。”①运用曹植和杨修之典故,刘孝绰洞悉萧绎,此其志不在小也,萧绎绝不甘心以舞文弄墨为一生之志业,萧绎亦心怀权力之居心。

萧统、萧纲谊属同胞兄弟,而萧绎则为其同父异母之弟,《文选》之《表》选取曹子建《求自试表》,《笺》选取杨德祖《答临淄侯笺》、吴季重《答魏太子笺》《在元城答魏太子笺》,《书》则选取魏文帝《与朝歌令吴质书》《又与吴质书》、曹子建《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吴季重《答东阿王书》等,这些文献透露曹丕、曹植兄弟间之微妙关系,而如此密集地刊载于《文选》之内,足见萧统严正告诫王弟谨守分际,不可僭越礼制! 因此,萧统重视这部分反映兄弟瞷于墙的文本资料,他要借此产生规劝作用,由此可窥其兄弟间之关系,一如曹丕、曹植之相与。尤其在梁末侯景之乱中,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后来之梁元帝,他“不急莽、卓之诛,先行昆弟之戮”②,可见武帝诸子间,其积怨之深,一旦大难临头,则暴露无遗!

道宣《续高僧传》卷第一《梁扬都庄严寺金陵沙门释宝唱传二》记述宝唱“寓目流《略》,便能强识。”③

《梁书·王僧孺列传》云:“昉赠诗,其略曰:‘惟子见知,惟余知子……刘《略》班《艺》,虞《志》荀《录》,伊昔有怀,交相欣勖。下帷无倦,升高有属。嘉尔晨灯,惜余夜烛。’其为士友推重如此。”④《梁书·简文帝本纪》记述:“太宗幼而敏睿……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⑤梁元帝萧绎《加王僧辩太尉车骑大将军诏》称赞僧辩曰:“学贯九流,武该《七略》。”⑥

继向、歆之学,宋齐时代目录文献学十分兴盛,此乃当时文士治学共奉之圭臬;萧绎《金楼子·立言篇九下》第 55 则云:“铭颂所称,兴公而已。夫披文相质,博约温润。吾闻斯语,未见其人。班固硕学,尚云赞颂相似;陆机钩深,犹称碑赋如一。”⑦从中可知当时文士推敲文体之辨析,若以《文心雕龙》为参照,这也为《文选》分体收集历代名篇范文,提供学术之借鉴。梁武帝三子文学观念其实不存在根本性歧异,然而缘于身份、处境之不同,令萧统编纂《文选》,与受萧纲影响之下《玉台》之选篇,二者所呈现之异趣则显而易见。《梁书·昭明太子列传》云:“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⑧萧统博览群书,他是深得《汉志》精髓之学者,王筠撰《昭明太子哀策文》云:“括囊流略,包举艺文;遍该缃素,殚极丘坟。縢帙充积,儒墨区分;瞻河阐训,望鲁扬芬。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⑨此属写实性叙述,离开东宫无与伦比的图书资料条件,或者缺少一位像萧统那样学贯古今文章之学的总编,《文选》必然难以达到如是之水准;梁简文帝萧纲《昭明太子集序》谓太子“至于登高体物,展诗言志”云云⑩,一并彰显其人在文章学领域之才气学习,盖为举世罕见者也! 有学者过分强调东宫才士对于《文选》编纂所起之作用,这种观点并不可信。在《文选》编撰过程中,可以确定萧统既发挥宏观主导发凡起例之作用,又在具体篇目遴选和篇次安排上,

---

① 姚思廉:《梁书》,第 481 页。
② 《梁书·敬帝本纪》所引述魏征之评论,第 151 页。
③ 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7 页。
④ 姚思廉:《梁书》,第 470 页。
⑤ 姚思廉:《梁书》,第 109 页。
⑥ 陈志平等校注:《萧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83 页。
⑦ 萧绎撰,陈志平等疏证校注:《金楼子疏证校注》,第 790 页。
⑧ 姚思廉:《梁书》,第 167 页。
⑨ 姚思廉:《梁书》“昭明太子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70 页。
⑩ 《全梁文》卷十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3017 页。

均作直接统筹擘画,他不愧为身体力行之总纂者①。

萧统撰《文选序》交代其编次所涉荦荦大端之考虑,其词曰:“……尝试论之曰:《诗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至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赋》《羽猎赋》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 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即伤,壹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萧统采用宏观诗学之概念,所以“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意指赋实质上是《诗》之一脉相承,仅名之曰赋而已。所谓“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在其所熟悉的《汉志》诗赋略中,陆贾赋之属,由于陆贾赋有赋名而文字不传,此一系亦不在主流,故而可以省略不提;至于“屈原赋之属”,缘于屈原之光彩照人,反衬楚王之昏聩颟顸,身为储君,萧统因此遮蔽其“词赋之宗”之地位,却以屈宋并列之宋玉作替代;而贾谊、司马相如恰好代表前汉小赋与大赋之最杰出作家,他们是战国荀宋之继承者,为赋体在汉代推向高峰,厥功甚伟!

而特意标举“凭虚”“亡是”,实际上,已经为《文选》大赋先张衡《二京赋》后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之篇次,预先定调。并且在《汉志》诗赋略中,被归于陆贾赋之属的扬雄赋十二篇,缘于在政治观、人生观、生死观方面,扬雄都与屈原扞格不入,因而不被置于屈原赋之属,然而观其《长杨赋》《羽猎赋》,却昭示着从思想内容以至艺术形式,扬雄皆部分扭转司马相如赋之写作范式,作为“扬班俦也”,从而奠定班固、张衡及左思赋发展之方向,赋史岂能不为之留有重要一席之地也?

本文开头引用吴讷关于《文选》中“《离骚》反置于后”之质难,其实假设《离骚》位列《文选》之首篇,从《汉志》六艺略之《诗经》到诗赋略之赋类,屈原曾具津梁其间之作用,故将《离骚》高悬于《文选》开篇之尊位,似也契合文章学发展之线索。然而作为自沉者屈原,伟既伟矣,却会为全书带来不吉之阴影,由于屈原自沉之后,楚随而为秦所灭,《文选》断不能依吴讷之意来设置篇次,对此读者易于理解。

再者,在宋齐梁时代,关于屈原其人其作,在儒林文苑形成一种共识,如《文心雕龙·辨骚》,之所以要辨《骚》,实因为《离骚》虽有“同于风雅者也”,可尚存“异乎经典者也”,其结论是:《离骚》“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②! 与之相类,锺嵘《诗品》仿照“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③,故而,若为上中下三品之五言诗人溯源流,此辈都可以追溯到《国风》《小雅》及《楚辞》三大源头,而源出于《楚辞》者,譬如李陵及其追随者,锺嵘暗指其人、文两端皆难免瑕疵,据此说明《楚辞》也被视作逊色于《国风》、《小雅》之存在,因此,《离骚》宜其被置于《文选》赋、诗选篇之后所特设之“骚上”。反观吴讷之批评,显然他不能体认《文选》编纂之政治语境。上已述及,张缵撰《南征赋》有云:“税遗构之旧浦,瞻汨罗以陨泗;岂怀宝而迷邦,犹殷勤而一致。蕴芳华以襞积,非党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辞,兼《国风》之美志。譬弹冠而振衣,犹自别于泥滓;且杀身以成义,宁露才而扬己? 悲先生之不辰,逢椒、兰之妒美……若夫屈平《怀沙》之赋,贾子游湘之篇,史迁摛文以投吊,扬雄《反骚》而沉川。其风谣雅什,又是词人之所流连也。”④张氏与王逸意见相近,反驳班固等对屈原所谓“露才扬己”之讥评,竭力为屈子翻案,然而,如此褒奖,即使与屈大夫产生精神共鸣,却和萧统之所思所虑,尚存巨大之隔阂。

《文选序》还谈及颂、箴、论、铭、诔、赞、诏、诰、教、令、表、奏、笺、记、书、誓、符、檄、吊、祭、哀、答客、引、序,碑、志、状,文体如此丰富,萧统形容为“众制锋起,源流间出”,它们俱有娱悦耳目之功能。

---

① 傅刚先生《〈文选〉的编纂及文本研究》批驳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教授过分突出刘孝绰助编《文选》之功绩,其见解客观公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下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3—158 页。

②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 52 页。

③ 锺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第 66 页。

④ 姚思廉:《梁书·张缵列传》,第 500 页。

萧统则择其经历士林评骘颇享佳誉之名篇,选入其中,成为《文选》诸体之代表作,足以嘉惠后学以至永远。

总之,诚如骆鸿凯《文选学》之《源流》第三所评论:“《文选》编次文辞,有增删者,有割裂者,有误析赋首或摘史辞为序者,至于标题、叙次之间,亦不无小失,此固无关宏旨,不足为其书病也。”①此说十分公允!

An Argumentation on “the Orderless Arrangement of the Writings in the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Wang Chunh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The order of arrangement of the writings in the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文选》) involved political, academic, and literary factors. Its study should take for reference such writings as the Records of Art and Literature from the Chronicles of the Han Dynasty (《汉书艺文志》) and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文心雕龙》). As the general collection of literary writings compiled by Crown Prince Zhaoming (昭明太子), the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naturally included such entries as the construction of rituals and music, auspicious embellishments, and strategies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it was certainly necessary to maintain and create the positive image of the Crown Prince Xiao Tong (萧统). All of the factors above contributed to the inherent rationale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Key words: Da Fu (大赋); order of arrangement of the writings; great significance and magnificent narration (义尚光大); brief account of poetry and Fu; study of the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骆鸿凯:《文选学》,第 35 页。